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九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五七期 ——
(二〇〇五年十月三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0a)

【本刊专稿】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一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余汝信
【争鸣探索】与《王力沉浮录》商榷	余言
【各抒己见】无知者无畏——评赵平波的谬论	丁凯文
【历史回眸】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	舒云
【历史一页】我和《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
——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 余汝信 •

专述文革经历的高干回忆录，近年极之罕见。故此，副标题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的《陈丕显回忆录》年初在境内外同时高调推出，各地报刊又争相转载推介，就显得有点儿特别而不寻常。（1）

陈丕显文革前夕官至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建国以降继陈毅、柯庆施后中国这一最大都会的一把手。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陈自述写该书的目的，“是想从一个角度揭露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作者特别引述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称，他的这部书稿，就是“遵循这个决议所阐明的原则，以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探索和研究”。（2）

那末，我们还是看一看，作为典型的官式文革史观——“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所谓“原则”，究竟谬误何在？而陈丕显所谓遵循此“原则”对文革的“探索和研究”，究竟距离历史事实又有多远？

一、泼在柯庆施身上的脏水

时至今日，柯庆施仍是官方党史上面目不清、难以论定的人物。虽则柯庆施在文革前已去世，陈丕显还是在他这部专述文革的回忆录中，对柯进行了“鞭尸”，将他的这位前任划入了江青、张春桥一类。为清算柯的历史旧帐，陈丕显谈了两件事。其一，“1950年，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南京市任市委书记。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同志，联名给华东局发过电报，发电报的时间是7月19日，电报的内容是‘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当时，华东局的领导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都看过这个电报。1954年，柯庆施从南京调上海工作，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对我打过招呼，并要我转告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魏文伯心直口快，把7月19日中央领导给华东局电报的内容说了出去，很可能是马天水知道了，告诉了柯庆施，这在柯庆施的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这份出奇地多人联署的电报出处何在？陈丕显没有说明。而所谓电文对柯的批评，亦非严重，倒是批评的轻微程度与如此多人联署不成比例，却使我们有一定的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至于上文中“很可能是”之后的内容，则不过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凭空想像和猜测罢了。

党内资历甚老而在延安整风后却一直受压抑的柯庆施，其实早于1949年粟裕还是南京市委书记时，已调南京任市委常委（并非如陈所说1950年才从石家庄调来）。翌年8月，接替唐亮任市委书记。时江苏尚分为南京、苏南、苏北三大板块，比柯年轻十来岁的陈丕显，为苏南区委书记。1952年9月，三大块合为江苏省，以柯为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调上海任第四书记（中央当时同意其代理第一书记）。时柯、陈皆为华东局委员，地位大致相当。

自1954年后的数年间，柯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1954年10月，中央调柯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1月，华东局撤销，同时成立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上海市委，并对苏浙两省委的几项主要工作保持领导关系，柯被任命为上海局书记。1958年，柯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重新成立六个中央局，柯为统领沪、鲁、苏、浙、皖、赣、闽六省一市的华东局第一书记。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是否可以套用陈丕显的“阴影说”，反过来观察一下陈可能的心路历程：1954年，柯调上海，将陈可能的由“代理”变为正式第一书记的路子堵死，陈几乎到手的上海一把手美梦破灭。1958年，柯的政治局委员地位已远远将陈抛离（陈不过是候补中委）。仅仅六年，柯、陈曾经有过的平起平坐的比肩状态早已不复存在，陈之于柯，只有听训的份儿（据说，柯的确比较喜欢训人，不过，训得也并非全无道理）。为此，陈的心里是否会有些酸溜溜的感觉？是否使自己“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陈丕显所指柯的“历史问题”，其二，远溯至1930年代：“1933年，党中央要柯庆施携大量经费从上海去满洲，因敌情紧张，柯庆施没敢去，就留在天津，花完了经费，写出假报告。开始的时候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说已去过满洲，就返回上海了。1935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到陕北找到党中央，这才揭穿了柯庆施这一段谎言。延安整风时，关于这段历史问题，对柯庆施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据柯庆施简历，1933年柯尚在河北工作，历任中共河北省前线委员会书记、军委书

记。1934年春，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调任中央满洲省军委书记，“赴东北途经天津时改任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1935年2月起任中共河北省组织部部长，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3〕

柯上海工作在前，留于天津在后，何来“后来又说他去过满洲就回上海了”？且中央红军1935年10月方抵陕北尚立足未稳，满洲省委是否可能即时“到陕北找到党中央”顺便告了柯一状？陈丕显的说法，漏洞颇多。延安整风时期，柯备受打击，陈这里不过是将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加诸于柯的不实之词，在半个世纪之后又重复了一遍。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引述了徐景贤文革中的一次批判发言，其中有两句是至今难以辩其真伪的所谓柯的话：“柯老生前说过：‘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

此外，陈丕显又说：“1965年，柯庆施在成都病故之后，贺龙元帅曾对我说过：‘柯庆施对陈的看法是：一、不突出政治；二、尽抓油、盐、酱、醋、米’。此话和江青的话完全一样，显然他们以前有过议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子文同志对我说：‘我们是共命运的人。有些事如果现在还不告诉你就对不起你了。柯庆施至少三次要把你调离上海，后来都因毛主席、少奇、小平同志，还有陈老总不同意才没有调成’”。

这类两个人之间的私房话，当事人又逝去多年，“死无对证”，如何能够证实？陈处处声言自己受柯打击排斥，又意欲何为？

文革期间批陈丕显，将其与柯工作中的某些不同意见无限放大，称之为“反对柯庆施”，而“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当然是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惟待文革结束多年之后，陈丕显自己又将与柯的某些不同意见加以放大，将其升级为与柯庆施——江青——张春桥之间的斗争，时时处处要与柯“划清界线”，这是否又是另一种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呢？

与那些不能分辨真伪、不能查证的私人谈话相反，今天，我们所能从公开渠道查阅到而又是陈丕显不愿写进回忆录的，是当年他本人对柯庆施的冠冕堂皇的极度褒扬之辞：“柯庆施同志在他的光辉的一生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义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柯庆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他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柯庆施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是华东各省和上海市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都感到深切的悲痛”。〔4〕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些话，才是陈丕显的由衷之言？！

其实，真实的柯庆施，也许并不如陈丕显在柯去世数日之后所吹捧的那么高大，但也肯定不象陈丕显在柯去世近三十年后所贬损的那般低下。在柯庆施的身上，无可避免地带有当年人们所习见的那些“左”的烙印与痕迹（这样的烙印与痕迹同样存在于陈丕显身上），然而，决不应全然否认他为上海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而柯的贡献，在陈丕显的回忆录中是一丁点也看不见的。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与当年地位相当的另外几位中央局一把手如陶铸、李井泉、刘澜涛相比较，柯庆施在“左”的路上并不见得比他们走得更远。当日，陶铸在广西南宁得知柯去世，即写了一首《哭柯庆施同志》云：“羊城话别竟悠悠，风义相期失畏俦；世有良材天不永，国多哀思树为秋；心存马列魂犹烈，功在东南愿已酬。处处春申凄咽雨，我含热泪抑悲愁”。〔5〕陶铸这首诗虽算不得什么好诗，惟对柯惺惺相惜之意表露无遗。今日，传统的中共史学界既然仍将陶铸视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又为何非得要将柯庆施打入另册？

二、是谁招呼了“女客人”

陈丕显说，中共建国后，江青常到上海，“根据当时的保卫制度，负责接待和警卫的同志一般都称她为‘女客人’”。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多处强调了“女客人”与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间非一般的关系，尤其是在“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产生过程中，“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又称，江青曾对他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

然而，将支持1965年11月才公开发表的姚文的“责任”，全部往当年4月已去世的柯庆施身上推，首先在时间上就大有疑问。

陈丕显自己在回忆录中说：“1964年初，柯庆施已经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

柯的女儿柯六六对其父亲这一段治疗情况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柯六六回忆，柯于1964年3月即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经医生确诊为肺癌。4月，在华东医院动手术。7月，离上海赴北戴河疗养。9—10月间，在北京休息。1965年初，到广州疗养。原计划疗养一段后即回上海工作，惟周恩来电示柯须安心养病，不必急于返沪。3月，转往成都继续疗养。4月9日，因胰腺炎突发病逝于成都。〔6〕

陈丕显与柯六六两人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柯庆施早于1964年初已因重病而脱离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年中即到外地疗养，自此未能回沪。而“1965春节刚过”再次到沪的江青，并无可能与柯在上海见面（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江青到上海前曾在外地见过柯）。江青后来多次称柯对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很支持，今天看来，类似如此这般说法，目的不过也就是打着柯庆施的旗号，以争取华东方面的更大支持。

上海老一辈学者邓伟志先生对柯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作过一番调查。据邓称，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后来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也说，姚文“与柯庆施毫无关系”。另“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7〕

1965年5月，柯庆施已不在人世。所谓“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邓伟志为尊者讳，未有点名，笔者倒认为他指的就是陈丕显等。

据陈丕显自己说，他与江青早在1950年就认识。那时，“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8〕

江青是否1950年代初即与毛“闹别扭”，难以查证。在上海的陈毅怎么知晓北京毛家的私事，也令人深感疑惑。可确定的只是，江青到上海哪也不住，就住在陈丕显家，可见陈当年也应很有些通天的机会。只不过柯庆施到上海后，这样的机会就是柯庆施的了（不过江青似乎从未住过柯庆施家里）。

陈丕显又说：“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上文已经说过，江青1965年初到上海时，柯早已在外地疗养，江青如何能与柯接上线？既无接线，又何来断线？如按协助姚查史料的那位历史教师的说法，1965年5月才动笔的姚文又如何能与江青已向其交了底的、柯在上海的继任人陈丕显没有任何干系？

实际上陈丕显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姚文的筹划：“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有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仅仅就是“信使”这么简单？不参与其中了解内情，陈怎么知道他带至北京的是第八稿？

陈丕显介入并支持了江青在上海活动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当为毛泽东在著名的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的一句话：“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9〕

魏即魏文伯，陈即陈丕显。陈口口声声说自己对江青敬而远之，避之则吉，那又何必拉着她再“住一会儿”？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是太急于撇清与江青的关系了！其实，在文革发动阶段，陈丕显、魏文伯等与江青之类并无根本的意见分歧。相反，在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的运动前期，华东局、上海市委亦是积极参与的（这方面的例证，我们下面还将谈到）。当革命尚未革到自己头上，革别人的命总是痛快的。只不过到了批“资反线”及其后阶段，运动冲击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事情才起了根本的变化。陈丕显的忆述，并没有客观地、完整地反映出这一事态发展的真实过程。

三、被颠倒了的关系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此一“原则”为什么是谬误？最简单的回答是：主次关系、主配角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之实践。始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

1、毛与柯：何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基础

陈丕显对柯庆施1963年12月25日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进行了指责，称“柯庆施这篇讲话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了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

惟陈丕显多少也算明白的是：“柯庆施之所以敢如此讲，也是有背景和来头的”。其“来头”，就是柯讲话前不及半个月——12月12日毛泽东的那一“重要批语”：“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0〕

是有毛泽东的批语在前，柯庆施的讲话在后。主次关系既然如此清晰明了，那么，“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的，为什么不是毛的批语反倒是柯的讲话呢？既然有毛如此严厉的批语，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全党（包括了柯庆施以及陈丕显）岂能不有所动作？我们注意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有意略去不提的是，他本人也是参加了此次观摩演出开幕式的众多“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之一。12月25日当晚，陈亦与柯一道观看了开幕演出，以示支持。〔11〕

2、毛与江：批《海瑞罢官》事先经毛同意

至于受到陈丕显极力抨击的江青到上海组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决非是江青个人的行为。江青事后说过：“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12〕

陈丕显自己亦说，1965年9月到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和魏文伯从毛泽东本人的讲话中已经意会到毛“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而且“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毛泽东瞒着政治局其他常委，瞒着北京市委，“允许”自己的老婆去从事一次非组织的地下秘密活动，这就是姚文元文章真实的产生过程。明明毛是整个事情的主导者，他利用江青及华东局、上海市委（张、姚也是上海市委的人），怎么会变成“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姚文在《文汇报》发表后，各地不谙内情，转载时间多有所延误，北京更是拒不转载，引起毛的极度不满。陈丕显将因果关系颠倒为“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的不满”，“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

到底是江青发牢骚激怒了毛，还是彭真的态度激怒了毛（想深一层，或是毛设了一个局要彭真往里钻？），毛本人倒是说得很明白：“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

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13〕

3、毛与林：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陈丕显说，它是林彪对江青“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它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行政治交易的产物，也是两个阴谋集团最早共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与组织并全程参加了“座谈会”的刘志坚说过，“座谈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座谈会纪要”先后写了八个样稿，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样稿作了重要修改。第一稿在送给江青的同时，也给正在济南的林彪送了一份。林通过而江不同意，江认为此稿“根本不行”，并称她已告之了毛，毛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从此林彪再未过问此事。〔14〕

江青在没有再征求军队方面意见的情形下，将修改稿铅印直接送毛审阅，据江青说，毛“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此番审阅，毛共修改了十一处之多，其中最重要者为：

（1）在原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由原“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原稿第一部份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根据毛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样稿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并又送毛审阅，毛又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及后，于1966年3月17日去信江青：“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是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5〕

3月17日的信表明，毛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江青，如何运用政治手段将林彪及整个军队一步一步拉上文革的战车。所谓“林彪同志委托”六字，是毛泽东所加，可以说，是毛强加于林的。“座谈会”实质是由毛自己委托，“座谈会纪要”的基调是毛所定，体现的是毛的思想而决不是别的什么人的思想。

四、被回避的与被扭曲的

上文提及，在文革发动阶段，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全国上下大小党委一样，不得不紧跟形势，其间，也伤及不少无辜。作为当事人，陈丕显本应对此有所检讨，惟在回忆录中，陈显然有意回避、有意略去了从1965年9月至翌年8月这近一年间各级党委主导文革时期的一系列有关事件。

为了说明陈丕显回避、略去了什么，我们不妨引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1966年6月10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万人干部大会上的一段讲话：

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很多。在这些阵地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直在激烈地展开争夺战。有一部分阵地，实际上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手里，他们篡夺了这些阵地的领导权，时时刻刻都在向千百万人民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为夺取我们政权、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前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前副部长陈其五，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猖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窃据的领导职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方针，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窃据音乐工作的领导岗位，一贯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咒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音乐教育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抗。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纠集一班人，创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咒骂党中央、毛主席。市委党校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以来，不但不热心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反而攻击毛泽东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院，长期抵抗党的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上海市电影局，是大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权威”、“名人”集中的场所。这批所谓“权威”、“名人”被捧上了天，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拍了很多反动的、反革命的电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党员总编辑李俊民，一贯对党进行恶毒攻击，放出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毒草。我们一定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加以揭露，彻底加以检查，把这些单位的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坚决夺回这些单位的领导权。

曹荻秋又说：在我们上海还有一批资产阶级所谓“学者”、“权威”，几年来，他们大放特放毒草，其中突出的有：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抛出了反党纲领《创新独白》，周谷城抛出了反动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李平心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周予同发出了“披逆鳞”（即刀劈皇帝喉咙，周予同的意思是刀劈革命领袖的喉咙）的极端反动的叫嚣。这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论，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开路先锋”。这批资产阶级的所谓“学者”、“权威”，实际上是一批反共专家。我们要发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把他们彻底揭露、彻底打垮。（16）

此外，《陈丕显回忆录》的编者称，该书经“有关领导和专家”先期看过，又经“精心整理”，但我们还是发现该书有违史实、扭曲史实的“硬伤”颇多。因篇幅关系，仅举数例。

（1）“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上海为史沫特莱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主席会见柬埔寨的朗诺”。（页34）

史沫特莱早于1950年在伦敦病逝，翌年在北京举行过追悼大会和隆重葬礼，何来1965年11月周恩来还为其“祝寿”？而据公开资料，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和江青接见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日是斯特朗八十寿辰，毛和江向她表示贺忱。（17）可见，虽然公开资料未透露周到上海亦为祝寿，惟陈著的“史沫特莱”实为“斯特朗”之误。毛和江一并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稿与照片，此前鲜有。这是文革前夕毛对江的政治酬谢，是毛有意发放的重要政治信息。为陈“精心整理”回忆录的“专家”为何如此粗心大意，将如此重要信息涉及的人名搞错？

（2）“林彪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叶群后来自己告诉我们，一共汇报了六七个小时之久。12月2日，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做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页39）

稍对文革史有所了解的学者都应知道，毛的这一批语，是批在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个报告之

上。该报告题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林彪按正常上报渠道报送作为军委主席的毛，并在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18）

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林彪致毛的信，谈的均是部队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问题，根本没有提及罗瑞卿一字一句，如何是诬告罗的材料？至于毛在报告上那一段“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的著名批语，人们普遍认为是罗的不点名批评。惟此看法，不过是一种揣测，从未得到毛的承认。而即使毛的批语是有所影射，那也是毛的问题而决非是林的问题。

（3）“3月19日，江青将纪要送林彪，林彪为了讨好江青，作了肉麻的批示：‘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作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页47）

据刘志坚：“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3月22日晚，林改毕定稿。（19）

林彪的信开头称：“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从中可见，林在信中执意重申座谈会是江青“她召开的”，避免提及什么“委托”关系（林内心深处肯定不承认座谈会是他“委托”的）。此外，因纪要“又经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林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惟全信并无涉及对江青个人的评价，更无以上陈丕显所引的那些“肉麻”的话。

（4）“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页204）

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是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不点名指责陈丕显（还有曹荻秋）的，是这么一段：“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20）

除此之外，讲话中再也没有其他涉及陈丕显处，更无“如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这么一句话。那末，为什么陈丕显可以无中生有地“回忆”出这么一句江青“恶毒诬陷”陈由“红小鬼”变“黑小鬼”的话且在书中多处反复提及？个中缘由，外人不好猜度，可能只有陈丕显自己心知肚明了。（2005年9月）

注释：

（1）《陈丕显回忆录》2005年1月同时推出两个版本，即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简体版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繁体版。

〔2〕本文所引述的原文，均出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简体版。引文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3〕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页293。

〔4〕“在上海各界追悼柯庆施同志大会上陈丕显同志的悼词”，《华东通讯》1965年第5期（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通讯编辑室，1965.4.28）。

〔5〕《人民日报》1965年4月15日，第二版。

〔6〕柯六六：“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江淮文史》2004年第5、6期（合肥：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4）。

〔7〕邓伟志：〈评柯庆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华东局宣传部长1966年5月前为夏征农，后为张春桥。

〔8〕陈丕显没有说明当时他家的小楼是在那一座城市。如果他指的是上海的话，那么他所回忆的最早认识江青的时间应有误——陈是1952年3月才到上海就任的。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71。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36—437。

〔11〕〈华东区举行话剧观摩演出〉，《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9日，第一版。

〔12〕〔20〕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13〕“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2.3）”，《学习文选》（武汉：编者佚名，1967年11月），页807—808。

〔14〕〔19〕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刘所引用的毛的修改稿，个别词句与“纪要”最后定稿有出入。

〔15〕同〔9〕书，页23。

〔16〕《华东通讯》1966年第13期，页10。

〔17〕《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5日，第一版。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手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86—487。

~~~~~

## 【争鸣探索】

### 与《王力沉浮录》商榷

• 余 言 •

河南省《党史博览》2005年第4期，刊载了署名“霞飞”的文章《王力沉浮录》。文中涉及“武汉事件”与王力的一些问题，叙述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特罗列、商榷于下：

1.《王力沉浮录》原文说：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

实际上是：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武汉军区就酝酿支左，并且表示支持包括工人总部、二司在内的各个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批发军委八条，是在1月28日，武汉军区介入支左，在军委八条发布之前。时间有出入。

不过在2月上旬，新成立的支左指挥部经过分析，对什么是左派组织的看法有了变化。

2. 原文接着说：“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

实际情况是：军区支左办公室2月1日成立刚成立，并未马上对复杂局势表态，直到造反派中的两部分不同意见的组织，就局势和发表“二八声明”问题产生争执与激烈辩论，军区副司令韩东山、副政委叶明在2月8日当天就商议决定批判“二八声明”，并且很快在社会上公开表态；军区的态度得到造反派中的新华工、新湖大、三司的赞扬，参与起草“声明”的造反组织如二司、工总、九一三等才不高兴了。至于当时军内机关、学校、后勤部门的造反派，与以上社会两部分造反组织都有密切联系，后者都同情军内造反派的观点与境遇，与他们都有联系（或说“勾结”），不存在没有得到支持的组织与军内造反派勾结的问题。

新华工等组织要拥护军区压倒对方，二司、工总等要求军区改变态度支持自己。在支左指挥部刚成立的2月，还不存在社会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军区的问题。

直到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武汉军区派部队进驻红旗大楼意在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军队内造反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解放军；武汉军区不支持《二八声明》”；认定其“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大方向的”。表示“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飞机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2月19日，武汉部队发布公告，指责部分造反派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和领导干部，是反革命逆流。在2月中旬旬末，受到军区观点压制的一派造反组织，将怀疑与不满指向军区，但没有冲击军区；对于军区取缔军内造反组织和抓人，两大部分造反组织均表示不同意。2月27日武汉工人总部部分头目，前往军区司令部请罪，承认自己支持“二八声明”的错误。3月16日，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接见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说二司犯了严重错误，希望通过整风把二司整好；军队还是会支持的。当日，二司整风办公室召开开门整风大会。次日，二司头头去军区、支左办公室表明认错。二司司令部开始自我整风。

客观地说，直至3月中旬，受到军区支持和批评的造反派们，都还没有将矛头公开指向军区。原文过于概括，表述的时间与内容有误。

3. 原文说“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

实际上，1月9日，造反派就接管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之后，报社发表了一系列鼓动大批判、联合、夺权的文章。原文所说的时间差了一个月。

4. 原文说：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

3月17日，武汉军区发布通告，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拘捕485人。这一行动首先引起二司学生的不满，同情与自己相同观点的工人总部；但二司处于自己也说不清楚状态，压力很大，没有敢公开指责军区。3月26日，军区支持的学生造反组织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首先公开宣称，武汉有一股反动复辟逆流，并到二司院校，声援一度闹翻的二司学生，倾诉革命造反情谊。这天，二司头头也开会，号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起来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4月1日，三新、二司联合召开大会，举行游行；表示要团结起来打倒“武汉的谭震林”；尚未点陈再道的名字。同时，军区也邀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座谈，研究帮助二司整风；新华工、新湖大决定不派人参加二司整风，相信二司自己能够整顿思想。到此时，原来发生争执的造反派已经团结在一起，并认为武汉有压制造反派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谭氏人物”，

内部认为就是司令员陈再道；但还未公开贴出“打倒陈再道”的标语。

到4月6日，有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组织一群造反派中学生，以“新华工敢死队”名义，贴出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中的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大字报历数了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大量“事实”之后指其“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打支左之名、行支保之实”、“为武汉谭震林张目”。将揪出“谭氏人物”的口号，首次公开到社会上。4月11日，个别学校一些学生成立“专揪武汉谭震林战斗队”。也还没有具体提出“打倒”。15日，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到一中学生绝食现场，代表军区答应学生的四点要求：有学生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孔庆德”，孔愤怒，当日就否认了已同意的四条协议。此后，造反派与军区一些领导的冲突开始走向极端对立。

5. 原文接着说：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从原文讲的3月，到6月底王力去云南前，没有任何事实与迹象，可以说明王力意识到在武汉“‘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与谢去云南，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派遣的，当时中央的意图，仍然是武汉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一些省区问题，派员在当地解决。周恩来是到7月10日才告诉陈司令，不用来北京了；到13日中央高层会议，才通知中央文革说毛泽东、周恩来亲赴武汉。这半个月王力不在北京。据与王力同行的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证实，他们6月出行根本不知会去武汉，更没有带任何与武汉有关的资料。后来审查王力多年，也没有任何地方说明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这个说法是否是杜撰的？

6. 原文说：“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文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

实际情况是，谢富治、王力13日刚到重庆，谢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次日赶到武汉有任务，王力并未与周通话，又如何去找远在北京（或武汉）的周要求什么？按张根成回忆：当晚，总理从北京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王力与众人议论刚到重庆，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又要赶到武汉？谢、王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关锋接电，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所以谢、王一行是14日午后在武汉见到周恩来，才知道毛泽东亲自来武汉解决问题，要他们配合，似不存在原文说的情况。

7. 原文接着说：“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

实际情况是：14日晚，谢富治首先提出去看看，不是王力。一行人是由军区同志带路，不存在“有意”在何处下车。他们的身份是被群众认出来的。次日造反派的游行，是先前早已经组织好的“粉碎刘少奇新反扑”，不是得知中央来人专门举行的；游行里也包括有欢迎标语，是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首长”，但不是专为“欢迎他……”。15日以后，王力不是陪谢富治，而是谢、王陪周总理同军区领导谈话，听取汇报。是周恩来主持了解决武汉问题的全部活动，不好说是王力个人对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8. 原文说：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谢、王是16日深夜去“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当时毛、周要他们接触各派群众，做工作。是谢富治以公安部长与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把他们的头头名单要到手，不是王力。王力的确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 立即停止武斗；2. 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 撤除所有的工事；4. 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 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 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 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据次日“百万雄师”的内部传达，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

不过，他们对中央文革早就有了看法，他们与一些军队干部，已经认为中央和中央文革在全国支持造反派的路线是错误的；王力与他们接触前，武汉已经散布了王力是国民党员、是刘少奇的人的政治谣言。16日白天，北京来人还没有与“百万雄师”接触，武汉三镇已经出现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17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应该说，“百万雄师”与独立师已经充分分析了形势和可能，不存在短短20分钟的接触，就把“百万雄师”激怒了。王力当晚的态度是过于强硬和不耐烦，而且在两派群众面前讲话的感情、词语倾向的确不同，但这不是“激怒”的根本原因。“百万雄师”到19日要追究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实际上是周恩来18日在军区师以上领导会议讲话的要点，即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基本原则，这是迄今任何谈述武汉“720事件”的公开文献，有意回避的。原文如此行文，似乎仅仅是王力与“百万雄师”群众在16日夜的接触，导致了“百万雄师”对他个人的不满，冲击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这是将事情过于简单化和偶然化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所以，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7月21日晚饭后，与身边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7月25日，周总理在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大会上没有讲话，但同日却接见了河南军队干部，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当时周恩来并不像《王力沉浮录》说的“周恩来”那样，把事变归咎于王力个人。

9. 原文说：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〇”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

26日的中央会议，是中央高层决定召开的，不知原文说王力、戚本禹找江青，江又去“逼周恩来”开会的根据何在？好像常委扩大会是他们几个人可以商定且逼迫召开的。这与当时中央高层的实际运作不符。7月26日会议的参加者健在的还有一些，他们看到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而且宣布事件是“叛逆行为”，陈、钟听罢几乎瘫倒，这是不是江青他们逼的结果呢？当时的情况下，周的话是违心的吗？

10. 原文说：“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周恩来是什么时候对王力有看法的？原文没有提出有力的依据。他们是22日下午才从武汉回到北京的，王力被送去休息与治疗；周恩来接着在凌晨主持文革碰头会，又到林彪处开会商议，亲自起草给武汉军区和空军司令部的电报，通知有关军队领导来京。23、24日，王力没有什么公开的活动，邓颖超还代表总理去钓鱼台慰问王力，送毛主席塑像，有什么迹象说明短短的几天，周恩来就“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呢？周在25日大会上没有讲话是事实，中央任何领导人没有大会讲话，这还不足以证明他对王力已经不满，不然他当日在接见河南军区领导时，还会那样说呢？

11. 原文说，7月26日，“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实际情况是7月26日夜，周恩来先去林彪处，又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宣布了隔离王、关事宜；23时才去另一个会场，会上，谢富治、王力正在与武汉在京的一些群众谈话，在等总理来。周与谢、王一起和群众谈话，会毕已是27日零点多。不存在当晚召开中央碰头会、当时就抓了王力的事。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宣布毛泽东的决定，是8月30日晚上。在这之间的4天里，并未限制王力的行动。

12. 原文说：“‘七二〇’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实际上王力在7月20日当天，身不由己，不可能向毛、林汇报，何以与林彪写材料？林彪与毛泽东写信是在7月20日下午。据邱会作回忆：当天上午，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派部队赶赴现场。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谢富治、王力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到处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他们自找的麻烦，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叶群答：“现在群众恨死中央文革了，她要去了，群众照样揍她”。林彪说：“你立即告诉吴法宪、余立金，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和总理磋商，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并派我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

所以，不是林彪相信了王力的说法才给毛泽东写信的。

以上几个地方，皆与历史事实有出入。

况且后来，中央专案组和中纪委没有因为武汉事件去追究王力个人的行为、责任，以上一些根据市野传说指责王力的问题，又发表在党史刊物上，是否严肃呢？

~~~~~

【各抒己见】

无知者无畏——评赵平波的谬论

• 丁凯文 •

这几天偶然在华夏文摘增刊上看到赵平波先生一篇妙文——《林彪一案是冤枉的吗？》，初看还以为是老共又在海外发起了文革式大批判运动，粗看几眼才知悉原来赵某人不满于本人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的主要观点，因而撰文予以辩驳。然而细品赵某人这篇文章却发现，此公可能根本就没读过《重审》一书，对书内是何主要观点也不甚了了，仅凭网上本人的一篇答记者问就敢挺身而出，口沫飞溅，可批来批去却丝毫未涉及《重审》一书的主要内容，真可谓胡批乱侃。赵某人连历史的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就敢放言高论，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本人就赵的几个观点予以批驳，就正于方家。

一．是谁的逻辑混乱？

赵先生在该文开始处，指责本人逻辑混乱，似乎赵先生在行文方面逻辑严谨严密，天衣无缝。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谁逻辑上混乱吧。

通观赵先生的全文，赵先生将林彪其人归结于“赌徒”。那么证据何在呢？赵先生列举了一系列林彪的“劣迹”，诸如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的批彭，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捧毛以及文革期间对老毛的大树特树。赵先生认为，林彪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押准了毛泽东的“宝”，从而扶摇直上，直到最后“赌”过了头，要篡党夺权，因而惨死于异国他乡。赵先生的结论是，如此“赌徒”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算得上是冤屈吗？

如果我们按着赵先生的逻辑思路来分析一下老共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老共高层人物里与林彪不相上下的还有很多人。随便举个例子，刘少奇和彭真最早在延安时代就将老毛捧上了天，刘少奇最先在党内发明了“毛泽东思想”，并将其树为全党学习的标杆；彭真在文革初期被打倒之前还自我标榜他是最早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人。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被捧上了神坛，从此成为了老共的“通天教主”。刘少奇也一跃成为仅次于老毛的第二号人物，成为诠释中共党权党法的权威。没有刘少奇和彭真等人的力挺，老毛如何能在那个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如何能彻底制服了王明所代表的“斯大林国际派”和周恩来所代表的“教条主义派”？刘少奇和彭真的所做所为难道不正是赵先生口中的“赌徒”吗？他们难道不是押准了毛泽东这个“宝”从而飞黄腾达的吗？建国后刘少奇等人也同样追随老毛大搞政治运动，害人无数，仅反右一项运动就打了全国五十几万右派分子，庐山会议上更是为虎作伥，在打倒彭德怀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刘少奇等人的“宝”一直就没离开过老毛。可最后刘少奇与老毛貌合神离，搞起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与老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格格不入，而老毛这时则将他们这些“赌徒”一举打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请问赵先生，按着您的逻辑，刘少奇和彭真等人被打倒是不是也不能算冤屈呢？

二．林彪一案定罪的根据何在？

本人说赵先生可能根本就没看过《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并非信口而言，因为赵先生在其妙

文中丝毫不曾涉及到此书中的任何主要观点，更惶论针对那些论点的具体论据予以评析。可赵先生竟然大言不惭说什么“实在没有必要花费笔墨对此来反驳”。本人要问问赵先生，你老人家连《重审》一书都没有读过，根据什么来反驳我们的观点呢？难道一句话就把全书都彻底驳斥了否定了？你的厉害和勇气，连国内正牌的党史研究者和御用文人们恐怕都要望尘莫及了。

本人分析说，邓小平上台后为了维护毛泽东这面旗帜不倒，在文革问题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手法，将毛的责任和罪过缩小，而将林彪和“四人帮”作为老毛的替罪羊为老毛背文革的黑锅。其实这个观点早就被世人所公认，请问赵先生，这个说法何错之有？终不成毛泽东还是伟大领袖，文革中只是犯了错误？这个论点与当今老共宣传的主旋律又有何不同呢？难道赵先生比老共还老共不成？要充当老共海外的发言人？

请问赵先生，什么叫“赌徒”？这顶帽子难道可以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的一项罪名吗？谁都知道，老毛给林彪钦定的罪名是“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和叛党叛国”，指责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的罪名千条万条，可却没有一条罪名是“赌徒”！赵先生可算是开了司法系统的先河，“赌徒”二字竟然也能成为一项打倒别人的罪名，不知此项罪名能否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大全。

林彪一案在毛泽东时代就被掺了许多假，人为地搞了大量的“逼供信”，那些给林彪头上安放的罪名没有一项是站的住脚的！邓小平时代不仅没有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事件，反而依然重复了毛泽东钦定的罪名，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不同见解的意见，并将林彪打成“反革命集团”。《重审》一书的作者们对这些罪名都予以认真详细的分析和批驳。如果赵先生对此不满意不信服，大可依据你所掌握的史实加以辨析，指出我们在这本书中有何不确有何破绽或漏洞，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人参与辩论和研究，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嘛。赵先生用一句空话“实在没有必要花费笔墨对此来反驳”不正说明了赵先生自己的心虚气短吗？

三．林彪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吗？

赵先生来到北美应该颇有时日了，美加地区的民主自由的空气多少也应对赵先生起点作用。可惜的是，赵先生的思维却依然停留在毛泽东的文革时代。赵先生竟然全盘认可毛泽东大搞政治迫害时给别人戴的帽子。请问赵先生，什么是“反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只要对当局的政策理论稍有怀疑质疑，对当局的举措稍有不满，就可能凭空被打成“反党集团”。老共建国以来这类“反党集团”难道还少吗？说白了，所谓的“反党集团”就是“反毛集团”或“反共集团”，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迫害的代名词，多少无辜之人因为这一罪名惨遭迫害，乃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反党集团”这顶帽子如今早已臭不可闻被人们所唾弃，可如今赵先生却依然拿在手里当成一条打击别人的大棒。现在连老共都羞于再提这项罪名，赵先生自己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神吗？

其实，“反党集团”这个罪名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是个挺吓人的大帽子，一旦被扣上此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可如今这顶帽子不仅不是什么耻辱，反而还是值得赞赏的称号。看看海外争取中国民主化法制化的人士和组织，哪个不是“反党集团”“反共集团”？“不反党”民主自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如果说林彪被老毛打成“反党集团”，那不正说明了林彪与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分道扬镳，在当今的时代不更应该予以正面评价吗？

林彪一案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什么“赌徒”不“赌徒”，而在于给林彪定案的证据是否真实可信。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能否被定罪，关键要看证据和事实，如果证据不充分，则罪名就不能成立。《重审》一书恰恰就是在大量分析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当权者截然相反的论点，指出当局给林彪所定的罪名的虚假和荒谬。如果赵先生愿意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

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我们当竭诚欢迎。我们所厌恶鄙视的是那种蛮不讲理和只会扣大帽子和打棍子的御用文人。我们也相信赵先生不是那种人。

历史研究没有禁区，那种人为地将研究划定一个圈子，只许歌功颂德的党规党法注定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历史和人民彻底唾弃。《重审林彪罪案》仅仅是一个开端，有人欢迎有人怕。广大老百姓是希望知道事实真相的，只有那些抱残守缺一心维护老共一党专政的人才会拼命予以阻挠。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实与真相还能掩盖到几时呢？

~~~~~

## 【历史回眸】

### 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

• 舒 云 •

1969年6月至1971年1月，郑维山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革”初期，时任副司令员的郑维山遵照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带领部队对北京和华北地区的多起突发事件进行处置，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首都安全做出了贡献。1969年他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带北京军区前指和部队赴内蒙古地区，保证了稳定北疆，增进民族团结，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革”动乱中，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郑维山在逆境中主持工作，他忍辱负重，尽职尽责，苦撑局面。1970年庐山会议后，北京军区党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开了50多天，郑维山在会上据理力争，险些病倒。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才勉强收场。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从此，郑维山的厄运来了。

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后来军委座谈会也并入，这就是华北会议。主要是揭批陈伯达，并严厉批判李雪峰、郑维山。会议分小会（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三种形式。由李德生、纪登奎主持，黄永胜、李作鹏到会，却不讲话。

陈先瑞回忆，毛主席说江青在华北会议上“反林有功”，江青也自认为立了大功，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并多次讲话。“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同志们想想，他们就在主席身边搞“山头”，这多么危险！现在查清楚了，这个“华北山头”不仅大得很呀，还有历史性和隐蔽性呢，军队的同志不能掉以轻心。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不知道为什么江青对北京军区的仇恨这么大，对北京军区的一些人和事记得那么多，她在一次会上一口气点了北京军区十几个人的名，而且每个人的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在“文革”那个特定的时期，被“伟大旗手”江青点名，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

江青还说，“华北山头主义”顽固得很呀，这个陈伯达就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政治头头，是太上老子。陈伯达为什么敢反党反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有“华北山头”作后盾。他有个武将叫郑维山嘛，郑维山和陈伯达搞在一起反对林副主席，看来，北京军区不改组不行了。

这回没有人敢保郑维山了，他先靠边站，接受批判，最终失去了自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以为有出头之日了，没想到江青却把“华北山头”的标签从陈伯达身上贴到林彪身上，说北京军区是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郑维山“摇身一变”，从反林彪又成了林彪的一员大将，伙同林彪反党。被押往安徽山区一个农场监督劳改。

“四人帮”被打倒已经两年有余了，被关押八年的郑维山仍是囚徒。郑维山的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做出结论。聂荣臻批示：请总政干部部阅处。郑维山子女的信和聂帅的批示，转到总政。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主任韦国清写了一个报告。因为郑维山曾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北京军区做出审查结论。12月12日，北京军区请示总政，郑维山已调离原职，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管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由总政负责做审查结论。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和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交代处理阎仲川等人的问题时，提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1979年2月1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胡耀邦的这个指示精神提出，郑维山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荣臻）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徐向前也打电话过问此事。

很快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派人将郑维山和家属接到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一稿。因为当时手头没有材料，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讨写的，写了郑维山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批示。郑维山的主要错误，一、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关于抓杨勇同志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郑维山审查结论，一、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1969年，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授意下，修建五台山林彪纪念馆，负有领导责任。还有几条如支左和抓杨勇与老帅对质，不好写入结论，算结论之外。

第一稿写好后，征求了郑维山的意见，他不同意。说这是根据我的检讨写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那么说。现在应该对华北会议批判我的几个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7月13日，郑维山写报告给胡耀邦，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因为，“华北山头主义”不平反，他的平反也不可能。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7月14日，总政副主任史进前打电话给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说昨天看见聂帅时，聂帅问，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要快点儿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华北“黑窝子”的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

7月22日，在总政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说，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电话通知了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说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袁升平政委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建议将我们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

9月1日，北京军区政委袁升平批示同意。司令员秦基伟圈阅。

郑维山的平反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他并不是“文革”初打倒的，而是在“文革”中工作了三年。包括上层，很多人认为没有在“文革”一开始被打倒就是有问题。

郑维山资历很老，从朝鲜前线到北京军区，却老是副职。直到1967年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相继被打倒，他才坐上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椅子。很多人传，抓杨勇是郑维山干的。此时杨勇已经从新疆军区司令员调任副总参谋长，他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但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这使郑维山的平反艰难起来。

当初，杨勇是怎样被倒的呢？

1967年初，廖汉生因为和贺龙有亲戚关系，最先被“烧焦”。“二月逆流”后，杨勇也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徐向前回忆，当时叶剑英说，上峰的意思，杨勇要“烧而焦”。

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陈先瑞说，杨勇被关起来后，他曾两次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立即上送了，上面没有人说话。在杨勇同志被打倒后十来天，毛主席2月3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我国访问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萧华，结果被别人打倒了。这说明毛主席也是知道的。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答复。“九大”期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军区杨勇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为此事，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有人借机把矛头指向郑维山和我，并提出谁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说这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这话被北京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得知，马上写了一份揭发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1969年10月，因紧急战备把杨勇疏散到外地，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1971年1月，杨勇在部队打篮球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要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

如此耸人听闻，北京军区党委非常重视，由当时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了三四个月。这时郑维山已经被打倒，重点落到政委陈先瑞的头上。要是罪名成立，陈先瑞肯

定逃不掉。幸亏周恩来过问，纪登奎在军区常委会下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北京军区没有责任。至于上边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你们以后也不要问了。还有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都是子虚乌有。这样，陈先瑞才被解脱，而郑维山却因为其它罪名继续“劳动”。

郑维山作为副司令员，他有什么资格抓司令员呢？而且，很快他也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是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下命令，郑维山才被放了出来。聂荣臻在电话中对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

但是，郑维山的结论时还有几个问题，一、慈县问题；二、冀东“黑党”问题；三、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两次去天津的问题。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重新搜集资料，找郑维山谈话，代中央起草了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初稿。稿子送聂总、徐帅审查。徐帅批示：不了解情况。聂荣臻对草稿亲自作了修改，10月29日退回，并指示快上报。

10月30日，史进前说，聂帅讲，你们总政办事太慢。于是，当日作急件报总政主任。

12月6日，中央发了1979年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认为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他们蓄意制造的冤案，现中央决定予以公开平反。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捏造了一条“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之后在北京军区一次又一次地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前后达七年之久。他们把当时军区一部分领导作为经营“华北山头”的代表，对这些同志罗织罪名，残酷地进行打击迫害，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等同志，特别是对聂荣臻同志，每次都要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们把北京军区党委分成“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六字号”的和“非六字号”的，把机关群众分成“保山头”、“爬山头”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他们还通过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等罪名扩散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

在此期间，他们在北京军区掀起了三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一是“杨余傅事件”后，捏造北京军区“在杨成武操纵、干预之下搞山头主义”。林彪当时曾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并派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坐阵指挥，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以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大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北京军区对内“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造谣说对三十八军采取了“搞臭、撵走、摧垮”的六字方针，把对干部的正常调动处理，都和所谓的“山头主义”联系起来。还诬蔑军区在领导班子里搞华北山头的“清一色”，在机关搞“以人划线，镇压群众”。对外“反政反民”，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并且胡说这种“山头主义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就这样给北京军区制造了一个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

二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又把所谓“华北山头”同陈伯达扭在一起。1972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后一段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参加进来，开成了一个全军性的会议），编造了一整套的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政治头头’”。把郑维山同志奉命陪陈伯达到内蒙视察，说成“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做准备”。并说这次“周游”“可能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说郑维山同志“伙同”、“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在庐山帮助陈伯达反党夺权，“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恃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作后盾”。公开诬蔑北京军区有一套“打烂三十八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她还疯狂攻击“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恶毒诬蔑聂荣臻同志“从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所有这些，全部都是蓄意的诬蔑和捏造。华北会议上，还对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进行了改组。

三是“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又掀起了反“华北山头”的高潮。他们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反林彪的，现在又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现在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现在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现在又说成是林彪的“大将”。这样，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搞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除继续批判郑维山外，变本加厉，又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华北山头的第四套班底”，作为靶子，加以批判。上述种种卑劣作法，充分说明了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

中央确认，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有在华北地区战斗过的部队和工作过的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是做出了宝贵贡献的。林彪、“四人帮”把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光荣革命史，横加诬蔑诽谤，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因为他们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看作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障碍，所以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恶浪，千方百计地要把过去曾在华北工作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打倒，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问题的实质。

现在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有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此件发到县团级，北京军区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虽然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发了，但有些单位落实的不够，有的单位没向下传达，有些同志的职务受了影响没有调整，郑维山的平反也还拖着。

郑维山到底有什么“罪”呢？

中央1971年6号文件记载，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第三部分是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主要说郑维山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还说郑维山一贯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再有就是家长制，搞一言堂，错误是历史性的，郑维山跟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

经过复查，这些问题基本都不存在了。于是徐厚田又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经过

反复修改，1980年7月12日最后定稿。从1978年11月6日开始接收郑维山，到1980年9月22日最后上报结论，郑维山的平反前后拖了10多个月。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对南萍同志的问题批示，（杨）尚昆、（韦）国清同志：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伙被牵连进去的。现在看，因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和插手，对当时军队被审查的一些同志定性和处理是错误的，其中有名的10名“大将”中的两员，郑维山同志已经改正，李雪峰同志虽然错误严重，但永远开除党籍，中央同志认为也是错误的，也准备改。

中央组织部1982年8号文件关于落实政策要善始善终的问题，提到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对“文革”中既犯有错误，又受过错误处理的，要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其所受的错误处理应予以平反纠正，对其说的错话，办的错事，要教育本人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写入结论。

郑维山终于被彻底解脱。

1982年，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小平接见他，说到作战问题，你是内行，我就不讲了。我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造福子孙后代；二是培养选拔好10个接班人。在西北任职期间，郑维山先后行程7万多公里，进行现地调查研究，按军委防御作战方针搞出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条件下的西北地区防御作战方案。

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被误解、被审查、被关押中，郑维山对党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始终如一。病重期间，他一再要求医院停止抢救，省下钱来用于统一台湾。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致信中央军委，祖国一定会统一，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他生前留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遗体供医学解剖研究，骨灰撒到家乡大别山。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只有两句话，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老战士。

~~~~~

【历史一页】

我和《大动乱的年代》

• 王年一 •

治中共党史，我是半路出家。

在中学时代，我在家乡江苏省扬州中学读书，读到高中三年级下学期。当时我参加革命心切，没等高中毕业就参军了。1952年，考进了华东军区文化师范学校语文系（在南京）。毕业后留校任教，当语文系教员。1958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文化教研室当教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借调到解放军报社9个月，在文艺评论组当编辑。回到高等军事学院后，我因对一派打倒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和院内大多数中层领导干部不满，而参加了与它对立的另一派。这样就站错了队，因而于1968年被调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四师第六十五团（即清水河农场）当副参谋长。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成立了军政大学（由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北京后勤学院三家合并而成），缺少教员。经北京两派同意，1973年3月，我从新疆被调回军政大学。当时军政大学没有文化教研室，而

我又没有专长，于是就把我分配到中共党史教研室。

1979年底，中共党史教研室决定加强对建国后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教学。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组（我是组长），在研究分工的会议上，组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万般无奈，“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就只好由我这个组长承担了。军政大学在1980年初就开设了“文化大革命”这门课，在全国也是开设得最早的。我勉为其难，讲“文化大革命”，也算是“逼上梁山”吧。

大家之所以不愿意承担，谁都清楚，难度太大。既没有教材，又没有资料，没有现成的路可走，我只有下死工夫。我查阅了“文革”10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查阅了10年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军委文件，查阅了我所占有的全部资料，草草写成教材，就上马了。

大概在1988年初，河南人民出版社决定编一套丛书：“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分为4本（按建国后中共党史4个阶段分）。丛书中要有一本讲“文革”。其中3本很顺利地约到了作者，签订了合同。“文革”这一册，本来约请名家金春明和席宣二位合著。不知什么原因，二位先生没有接受。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毛遂自荐，请求由我来写。丛进同志为我穿针引线，河南人民出版社同意了。在这套丛书中，我与出版社签订合同是最晚的——时为1988年3月。当时的责任编辑是汪琼女士。

当时的军政大学（这个大学早已不存在了，后来分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后来三家又合并为国防大学，校名改来改去，而我仍在中共党史教研室当教员）有一个“土政策”：凡教员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其报酬的60%要上缴教研室，由大家均分。我对这个“土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对策：我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到办公室写书，写到8点回家吃早饭，然后再到办公室上班。我想，既然我写书没有用办公时间，所得报酬当然一文也不上缴。这样写书效果特好。早上办公大楼内寂静无声，我的身体也处于最佳状态，因而进展神速。我写得快，当然也与我讲了七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关，与我主编了《文革研究资料》（三大册）有关。约在1988年7月，我已完稿，交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十分积极，立即印成了书。这就大大推动了其他3本书的写作。在4本书中，《大动乱的年代》是出得最早的。约稿最晚，交稿最早，出版也最早，这就是《大动乱的年代》。

《大动乱的年代》能够出版，也是万幸。河南人民出版社经过省委宣传部给中央宣传部上送了《大动乱的年代》，请予审查。这时，上面总的精神是不准出有关“文革”的书。我斗胆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不久，中宣部出版局的一位同志给我来了电话，说《大动乱的年代》已获批准出版。从这位同志报喜似的语气上看，出版局是理解我的。事后得知，审阅并批准出版的是中宣部副部长李彦。不久，河南人民出版社收到了中宣部办公厅的批准件。

香港《开放》杂志说，拙著是“官方出版物”，这完全出自臆想，毫无根据。“官方”对我没有任何授意，“官方”和出版社对拙著的书稿没有提出过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删削。《大动乱的年代》这个书名，与整套丛书相一致，是汪琼女士起的。

《大动乱的年代》一出版，引起各方关注。这不奇怪。拙著初版于1988年，时机是比较好的。在这以前，有过严家其、高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那本书有不少缺点，比较粗糙。

我写《大动乱的年代》，感到最难的是有关林彪的问题，如九届二中全会，如“九一三”事件，我研究不深，吃得不透，所以下笔时欲言又止，含含糊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动乱的年代》出版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当时的主任麦克法奈尔先生邀请我和丛进同志（“1949—1989年的中国”中《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的作者）去讲学，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由于一些原因，我们始终未能成行。

拙著显然是有缺点的。我在2004年版的《后记》中说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敬请尊敬的读者多多给予批评指正。

□ 《党史博览》2005. 9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